

多维视野下的中日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多维视野下的中日文学研究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野下的中日文学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1 - 3536 - 8

I. ①多… II. ①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②
文学研究 - 日本 IV. ①I206②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9443 号

多维视野下的中日文学研究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7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536 - 8

定 价 / 1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辞

田中典彦（日本·佛教大学）

去年，为加强学术和教育方面的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签署了学术交流协议。能够与作为中国智库的文学所开展共同研究，对于我校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基于学术交流协议，此次在北京召开第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会议），作为双方签署协议的纪念，我无比欣慰。在此，我谨向长时间以来理解并为此学术会议热心奔忙的双方人士致以诚挚的谢忱。特别要向第一时间将我们的交流设想变为现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位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我们佛教大学，如校名所示，以佛教作为建校理念。我们秉承的是在印度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和在镰仓时代创立日本佛教净土宗的法然上人这两位共通的教义和精神。2012年迎来建校100周年，为开展与当今时代相称的教育和研究，我们根据佛教精神将学校方针重新定为“转识得智”（将知识转化为智慧）。换言之，我们认为，将所得的知识转换成在人生的各种场合判断自己该何去何从并付诸实践的力量、生命的力量，这才是人应该做的。知识只有转化为生命的力量才有价值。

学问也是如此。只是为了寻求真实所得到的将仅仅是知识，不能对人类的福祉有所贡献。将探索所得的知识用于生存在社会上的人类，使其变成人类生存的力量，这才能被称作人的学问。学术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它将每位学者探明的真知加以理解，相互讨论并返还给社会，或许应该将其称作布施。

根据我国佛教史研究者的说法，佛教在公元纪年之初方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由印度语翻译成汉语，至隋唐时期翻译十分盛行。此后，佛教得



到中国式的解读和发展，并传播到日本。这其中无论哪个国家都经历了翻译→理解→发展的过程，并构筑起各国自己的文化。现在，我们的合作就是为了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彰显这些文化。

此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科诸项研究”，这一主题可谓恰逢其时。这是文学研究所与佛教大学学术交流的第一步，因此，为加深对双方学者研究内容的理解，此次会议不特别限定在中国研究及日本研究方面，而是希望通过更广泛研究领域的发言相互启发，作为今后研究交流的基础。

鉴于此，此次我校参会的是从事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及英美文学研究的精英学者。贵研究所方面将要在会上发言的各位也都是出色的人文学研究者。期待大家从各自的领域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在世界日益混沌不堪的当下，人类必须谋求新的生存之道的时代正逐渐到来。我相信，通过实现超越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共生，我们能够向新时代提倡人类的生存之道。

我由衷地希望这一成果能够对生存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有所启示。最后，祝愿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我的致辞到此结束，谨致衷心感谢！

(颜淑兰译)

佛教与中国文学结缘的启示（致辞）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田中校长、中原副校长、佛教大学的各位老师：

早上好！

佛教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历史古城京都，在百年名校佛教大学如期举行，我感到非常高兴。

“缘”是佛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借此机会，我想谈谈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结缘，当作我的致辞。

佛教与中国文学结缘，肇自两汉之际。自兹以降，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既广且深；若作概括，荦荦大者至少有如下数端：第一，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第二，佛教拓宽了中国文学的思维空间；第三，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题材。譬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所表现出来的上天、人间和地狱观念还比较简单，甚至还有一种幽暗的美。而王琰《冥祥记》及大足石刻所表现的地狱就非常恐怖，令人不寒而栗。过去，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常常有《大言赋》《小言赋》之类的题材，极尽夸张之能事，然而与志怪小说中幻化情节相比，实乃小巫见大巫，不足论列。至于文学体裁及题材方面的例证，如近体诗的出现，如魏晋志怪小说的繁荣，更是举不胜举。

过去往往将汉唐文学并称，其实汉唐很不相同。汉代融汇中原各个地区文明的精华，铸成中华文明外儒内霸的特质；而唐代则融汇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西域文明的精华，涵养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胸襟。作为一种外来文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结缘，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佛教进入中国，是一种双向选择：佛教选择了中国，中国也选



择了佛教，并使之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与儒家学说、道家思想一起，为民族亲和力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润滑作用。在改朝换代、民族冲突转剧之际，多元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黏合剂，互借所长，融合再生。

第二，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同时又改造了印度佛教，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原来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还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丰富、更健康地发展。魏晋玄学实现了儒道的合流，李唐王朝，三教并重，宋代则真正完成了儒、佛、道三教的融合。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出入于释、老，反求诸六经”，受到过佛学的启发，甚至吸收和改造了佛学的某些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尤其在当今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日益成为困扰世界的焦点问题时，这种兼容精神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第三，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大众化与本土化，转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成为明清时代标志性文体的小说，在晚唐五代接受了佛教俗讲的影响，于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在明代由富于创造力的文人参与，才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大奇书”。

我看到此次的会议发言中不仅有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话题，还有从历史、民俗、神话、近代化等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与思想碰撞的探讨。期待各位的发言能对当下的中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带来更多的启示。最后，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一 宗教与文学

- 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古文学思潮 刘跃进 003
- 吴越王金涂塔与阿育王塔形制关系考辨 王敏庆 021
- 武则天时期的佛教美术
- 以传入日本的劝修寺绣佛为中心 大西磨希子 044
- 汉译佛典中偈颂的律动 齐藤隆信 060

二 历史与神话

- 漂泊无助的远游
- 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及其他 刘跃进 075
- 论生日
- 周岁与虚岁 中原健二 091
- 魏晋南北朝鼓吹乐署考论 许继起 100
- 翟门生粟特人身份考
- 以萨甫为中心 黑田彰 117
- 两种时间的交叠 渡边秀一 128
- 关于时间概念隐喻的分析 濑户贤一 133
- 悖论式嫁接：比较神话学在晚清的出现 谭佳 147



三 近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化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王达敏	167
新闻进入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的承启意义与《铁达尼号邮船遇险记》的 叙事旅行 杨早	183
中国现代学术之梵文因缘 陈君	206
从“周树人”到“鲁迅”	
——以留学时代为中心 李冬木	224
无尽苦难中的忧悲与爱愿	
——论史铁生的文学心魂与宗教情感 李建军	242
文学与语言教育	
——2017年度佛教大学英美学科新生意识调查分析 松本真治	258

四 中日比较研究

中日古代“日记”之比较	
——以《御堂关白记》与秦汉时期的“日记”为例 西川利文	277
官僚出仕、晋升制度的比较史研究	
——以平安时代与唐宋的五位、五品以上的官僚为中心 佐古爱己 ...	291
祇园祭中的中国 八木透	304
日本文学的近代化与中国	
——以《小说神髓》的影响为中心 坂井健	311
近代中日印刷技术交流史初探 杨韬	320
新时期初的“日本文学热” 赵稀方	331
中日学者眼中的《桃太郎》 乌日古木勒	346
编后记	361

一 宗教与文学



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古文学思潮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 “中古”的概念及佛教传入背景

这里所说的“中古文学”，与日本学术界常用的“中世纪”有点相近。中国学术界一般认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把中古文学理解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曹魏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汉末建安二十五年间；而建安文学的兴盛又不仅仅是在建安年间突然出现，而是东汉以来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研究中古文学至少应当从东汉做起。陆侃如先生认为魏晋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玄学思潮，而扬雄堪称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编《中古文学系年》从公元前53年扬雄生开始。其实，刘师培心目中的中古文学，范围可能还要广泛一些。尹炎武在《刘师培外传》中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隶释》、《隶续》所录汉人碑版之文。”^①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观念，实际是指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他另外一部专著就叫《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今天所说的“汉魏六朝文学”，包括北方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代文学。我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的中古文学概念，下限可能要到晚唐。我划分中古文学的重要依据，就是文字载体纸张的发明、运用、抄写。通常认为，纸张的发现，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这可以作为中古文学的开端，是纸质钞本时代的开端。^②雕版

① 《刘师培全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第17页。

② 关于纸张的发明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我在《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一文中作了论述，刊发在《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又佐佐木聪先生翻译成日文，刊发在《东亚出版文化研究》2010年3月。



印刷的发明，约在晚唐五代时期，^① 文学转入新的形态，标志着中古文学的结束。

通常认为，佛教的传入，始于东汉明帝时期。^②《后汉书·西域传》汉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于是召集大臣以占卜所梦。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梁代高僧慧皎《高僧传》将此事系于永平十年（67），^③“或曰”，坐实为傅毅。于是，明帝派遣郎中蔡愔、秦景等十八人前往天竺寻访佛法，邀请天竺法师摄摩腾及竺法兰等到中土传法。他们携带梵本经六十万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洛阳，并创建白马寺，在此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佛教流通东土之始”。慧皎认为前“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我们知道，佛教发源于古印度，进入中国，大约有四条途径：一条在云南西部边境，经缅甸接壤地区传入，主要影响于西南地区；一条经过尼泊尔传入西藏地区；一条经过中亚西亚，传入新疆，并辐射到中原地区；一条是海上弘法之路，由南海到达广州，登岸后进入东南地区。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就从南海到广州。^④ 昙无竭从罽宾国取经回来，也是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回到内地的。

四条线路中，经过中亚、西亚进入新疆的这条传播路径涉及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这条路径的西南端往往是天竺和罽宾，而东端则是由中国的西北地区向中原、关中和东南地区辐射。天竺在今印度境内。^⑤ 罽宾，

①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

② 印度著名佛教史专家觉月《中印佛教交流史》根据《淮南子》记载的一个故事与梵文故事相近，认为佛教在西汉即已传入中土。不同地区流传相近的故事，这在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很常见，不能据此一定说中国的故事源于佛教。但是，佛教的传入，应当早于汉明帝。有学者说，张骞凿空西域，那个时候，佛教很可能就传入中国。只是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所以学术界通常以《后汉书》的记载为准。

③ 宋代高僧志磐《佛祖统纪》、元代高僧觉岸《释氏稽古略》并系于永平七年，十年返回。而元代另一高僧念常《佛祖通载》则将此事系于永平四年。可能的情况，永平十年为回到东土的时间。

④ 《高僧传·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宋京师中兴寺阿求那跋陀罗》。

⑤ 《续高僧传·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载，隋代大业二年，裴炬与彦琮等修撰《天竺记》。

在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史载，佛图澄、竺法兰、竺佛朔、康僧会、维祇难、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高僧均为天竺人。佛图澄由陆路进入中原，^①而真谛则由海路抵达建康。^②由陆路通常先要涉辛头河，越过葱岭（现称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往北沿着葱岭河到达龟兹。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地区。《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可见两晋、南北朝时这里居住的华人之多。《西域传》又说：“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可见汉文化渗透之深，而龟兹又是西域文化中心之一。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龟兹国，古书又有作归兹、丘兹、屈兹、屈茨等名。慧超称：“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张毅先生《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指出，龟兹人对佛教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有杰出贡献。佛教传入龟兹可能早于汉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佛教就很昌盛，尤其是龟兹。《晋书·四夷传》：“龟兹国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而汉地的统治者，无论是北方的苻坚、姚兴，或是南朝的梁武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于是在这个时期，佛教遂以空前的规模从西域向汉地传播。不少龟兹人也相继东来传法或译经。从龟兹一直往东，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西端的第一大郡敦煌。沿河西走廊向东，以凉州为中转站，分张两路：一则南下巴郡，沿着长江，抵达荆州、扬州等地。僧伽提婆即从此弘法长安。^③二是东进关陇。求那跋摩、佛驮什多、昙摩蜜多则由此弘法江南。^④此外，西亚的安息国、月支国等也成为弘法高僧的聚集地。早期传法的安世高，原本安息国人，汉桓帝初年即抵达中原，后来振锡江南，到达广州。^⑤支娄迦讖、释昙迁等为月支人。

除上述弘法高僧来自异域外，还有许多中土高僧西天取经，最著名者莫过于法显、宝云、智猛、勇法、昙无竭、法献等人。法显从隆安三年

① 《高僧传》《晋书》记载佛图澄事，多诞妄难信。然佛图澄乃释道安之师，道安又慧远之师，则其于佛学之传播，实有功绩。

② 《续高僧传·陈南海郡西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

③ 《高僧传·晋庐山僧伽提婆》。

④ 《高僧传·宋京师雍洹寺求那跋摩传》《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等。

⑤ 《高僧传·汉雒阳安清》。



(399) 与同学慧景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攀登葱岭，越过雪山，进罽宾国。抵达天竺，经历三十余国求得经书，他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法显传》。^①法显回来后也著有《别记》，可惜已经失传。而智猛从弘始六年（404）发迹长安，西天取经，整整经历 20 年的时间。

在南北分裂时期，六朝僧侣往返于各个文化区域之间，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加速佛教本土化进程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拓宽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题材。更重要的是，佛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 佛教文化与中古文学思潮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所谓异端并起，言下之意是指传统儒学式微，而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三种思潮的兴衰更替，促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季羨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道：“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②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佛教的传入对中古文学界的巨大影响。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及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有关章目，用“药、酒、女、佛”四字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现象。药与酒，主要是“竹林七贤”的选择。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作了精湛的阐释，而“女”与“佛”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鲁迅没有来得及展开论述，却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台静农先生《中国文学史》专辟有《佛典翻译文学》，论后汉魏六朝的佛

① 《法显传校注》，章巽注，中华书局，1982。其他几人传记见《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等。

②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典翻译以及译经的文体问题。作者认为，马鸣的《佛本行赞》就是一首三万多字的长篇诗歌，戏剧性很强。译本虽然没有用韵，但是阅读起来，那感觉就像是读《孔雀东南飞》等古代乐府诗歌。佛经《大乘庄严论》，类似于《儒林外史》。^① 20世纪以来的重要学者，如郭绍虞先生、罗根泽先生、饶宗颐先生对中古文论的研究，钱锺书先生、季羨林先生、王瑶先生等对中古诗文的阐释，都论及佛学对于中古文学的深刻影响。

佛教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②，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③，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④，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⑤，陈允吉《佛经文学研究论集》^⑥，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⑧、《中国佛教文化史》^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⑩等为近年有代表性的论著。蒋述卓具体辨析了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玄佛并用与山水诗兴起、四声与佛经转读、齐梁浮艳文风与佛经传译等对应关系。吴海勇的著作从佛教文学题材入手，进而揭示佛教文学的民间成分及其宗教特性，阐释了佛教翻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影响。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按照佛传、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因缘经、法句经等方面选择了34部佛典，辑录或者节录，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全面反映这类佛典概貌的基本选本。《中国佛教文化史》凡五巨册，180万字，按照时代先后论述了印度佛教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一，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僧团；其二，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信仰；其三，佛教的教理、教义包含复杂而细致的学理论证，其核心部分是宗教（佛学）哲学；其四，佛教教化以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为主旨，目的在塑造理想的人格（当然是按宗教的标准）；其五，佛教向中国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②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③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④ 中华书局，2002。

⑤ 学苑出版社，2004。

⑥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⑧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⑨ 中华书局，2010。

⑩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传播了外来的文学艺术，为中国的艺术、文学、工艺、建筑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外来的滋养与本土传统相结合，促进了中土这些领域的进展，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果；其六，佛教乃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津梁，对于促进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起了极其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允吉《佛经文学研究论集》是一部论文集，收录34篇论文，广泛地探讨了汉译佛典经、律、论三藏中与文学相关的论题。

中古时期两部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均与佛教思想的传播有着重要关系。《文心雕龙》既是一部齐梁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理论专著，体被文质，空前绝后。对这一特异现象的解释，我们无法绕过佛学影响这一重要环节。《诗品》不仅品评诗僧的作品，而且，在品评标准、理论命题等方面，也无不渗透着佛教的影响。我过去曾撰写《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锺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① 对此试作探讨，但还只是推测性的意见。

北魏造像艺术是中古艺术的高峰。北魏造像艺术的传世之作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北魏前期的云冈石窟，二是北魏后期的龙门石窟，三是自北魏以迄隋唐的敦煌千佛洞和天水麦积山。北魏前期，即自和平初年昙曜奏请建室起至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止（460~494），以云冈昙曜五窟为代表，充分反映出当时北魏君权从原始公社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期的无上权威，强调“佛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佛”，不论立像、坐像，都具有刚毅不拔、挺然大丈夫的风度，有压倒宇宙一切的威力之感和昂扬气势。北魏后期，即孝文帝迁都洛阳，龙门石窟修建到北魏末年（495~533），龙门石窟反映出那个时代北方民族在迁移到汉民族文化中心洛阳之后，一切都汉化了了的风格，不论坐佛、立像，都是秀骨清姿、宽袍大袖，具有六朝名士风度。^② 西部的敦煌千佛洞和天水麦积山则更发展了泥塑的艺术，这在北方佛教艺术史上，是中国自己的创造。^③ 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同。

① 《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锺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刊于《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② 参见罗忞（菽）子《北朝石窟艺术》，上海出版公司，1958。又见龙门文物保管所编《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80。

③ 姜亮夫：《敦煌造型艺术》，收入作者《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又参见常任侠《甘肃省麦积山石窟艺术》，文物出版社，1984。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82。